
燕南 66 学者沙龙 · 第 1 期

门罗主义话语的全球旅行——近代世界的霸权与反抗

2021 年 4 月 1 日

燕南 66 学者沙龙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推出的新系列活动。沙龙围绕“全球治理与发展”议题，开展跨学科对话，旨在促进北大校内不同院系、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分享和学习，回应全球化条件下知识生产日益跨学科的挑战。本期沙龙有来自外国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历史学系、法学院、教育学院和社会学系多个学科、多个专业的学者参与。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章永乐发表主题为“门罗主义话语的全球旅行——近代世界的霸权与反抗”的报告，沙龙由法学院副教授陈一峰主持。

门罗主义研究问题的提出与方法路径

章永乐副教授对门罗主义的兴趣源于近年来美国政坛重拾门罗主义的政治实践。虽然 2013 年美国时任国务卿克里曾经公开说门罗主义的意识应该结束，但 2018 年末至 2019 年初，特朗普政府重新加强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并且称门罗主义是非常正确、伟大的政策。但在面对中国时，特朗普又称中国的南海政策和“一带一路”都属于门罗主义。这里所使用的两个门罗主义具有不同的褒贬含义，说美国自己的时候是褒义的，而说中国的时候又变成了贬义词。这便引申出关于门罗主义定义的思考。

章永乐副教授认为，门罗主义话语从美国出发经过全球

旅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门罗主义。在欧洲有泛欧主义，即“欧洲是欧洲的欧洲”；在德国是大空间理论 GroBraum；在日本是东亚门罗主义、亚洲门罗主义，“大东亚共荣圈”背后也是门罗主义；意大利则有巴尔干门罗主义；托洛茨基曾批评斯大林搞的是“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有自己的门罗主义；非洲也有各种不同的门罗主义，比如牙买加的黑人民族主义者与泛非主义者马科斯·加维（Marcus Garvey）就提倡非洲人的非洲；戴高乐曾经在西非推行的殖民政策当时被称为法国门罗主义；印度的尼赫鲁也有南亚门罗主义。

到了近代中国，门罗主义话语就更加多种多样了。从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发展出类似的话语，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这是国家和民族层面的门罗主义。但有意思的是，中国的表述还从国家层面下降到了省域层面，所以首先有了反满地方主义与“门罗主义”话语的结合，然后再进一步下沉到各种各样的省域当中，尤其在联省自治过程中出现了省域门罗主义，比如“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浙江是浙江人的浙江”，“湖南的湖南人的湖南”等。为此，章永乐副教授试图进行一个类型学的分析，追溯门罗主义传播的完整轨迹。

章永乐副教授的研究方法有四。一是从全球思想史角度尝试给门罗主义下定义。这不仅是思想史角度的尝试，还是全球史角度的尝试。但是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它不是关键词的研究，因为它研究的不是一个关键单元的自我运动。

二是使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就是将概念作为一个能指，在不同语境当中、在实践当中获得它的意涵。因此需要看这

个概念的表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它在语境当中不断地流转，是如何变化发展从而最终获得了它的具体意义。

三是形态学方法。概念是一个不断变形的过程，像维特根斯坦讲家族类似的关系，虽然最终的产物与初期相比可能有着天壤之别，但中间光谱当中它的变化却是连续的。

四是门罗主义的概念还受到帝国与国际法路径的影响。帝国与国际法近年内在国际法领域和世界史领域当中是一个新的路径。国际法本身的研究也不能简单归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领土性国家、主权国家间的争斗的产物，而应该把它放到全球范围内帝国的斗争的语境当中来进行讨论。章永乐副教授认为，应追溯国际法的演变，以及门罗主义作为一个帝国建构的概念，如何影响国际法的转变。

在材料收集方面，章永乐副教授综合利用了自己在中国报刊数据库挖掘到的材料和已有的文献，用新的问题意识将这些材料串联起来。

门罗主义概念的演变：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例

美国

美国是门罗主义的发源地，其提出的背景是 1823 年欧洲神圣同盟意图围剿拉丁美洲的革命。英国期望与美国一同发表声明反对欧洲国家干预拉丁美洲的革命，但美国总统门罗着眼于美国将来扩张的可能性，认为与英国一起发表声明会限制美国的扩张，便拒绝了这一提议。1823 年 12 月 2 日，

门罗在致国会年度咨文中提出的美国对外政策原则，史称“门罗主义”。大体内容是：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在美洲的现存殖民地和保护国，不参加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欧洲列强不得干涉美洲国家的事务，并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

章永乐副教授认为，门罗主义是空间政治的观念，是美国划定的空间并建立了对立，这是腐败的专制欧洲和共和的美洲之间的对立。空间划定后，门罗主义再建立起空间内部的同质性，并将异质性的因素排除出去，比如欧洲因素就是异质因素，在美洲体现为殖民地的形式。美洲仍存在着大量欧洲殖民地，虽然殖民地的存在要早于门罗主义，但是美国对欧洲殖民主义采取更为进取、积极反击的态度。美国西进运动期间用门罗主义来处理它的扩张需求，解释称如果美洲有人民想加入美国的话，欧洲列强不得干预。

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美国总统格兰特又进一步论证说，从此以后，美洲各国不得把领土再转让给欧洲各国，哪怕是赠与也不行。南北战争后，美国加速建构区域霸权，尤其是 1895 年围绕委内瑞拉的斗争发生后，英国承认了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加之老罗斯福总统提出的罗斯福推论，美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洲的国际警察。在这个阶段，门罗主义从原来“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逐渐走向“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美国在中国讲求门户开放，与门罗主义也不无关系。门户开放政策在 19 世纪末已经成型，老罗斯福把它解释为美国在亚洲的实用门罗主义，美国在亚洲可以使用门户开放话语来排除欧洲列强对中国的干预。以此观之，老罗

斯福就将门户开放与门罗主义关联在一起了。

一战期间，威尔逊总统要冲击全球霸权，就需要重新解释门罗主义，把其中空间的概念进行弱化。门罗主义的核心变成了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受其他国家干涉。由此，这个路径便可以适用于全球。虽然威尔逊构建全球霸权的尝试失败了，但二战后美国又开始了新一次构建全球霸权的努力，这次最终取得成功。综上，在门罗主义的变化中深藏着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即先划定一个地理空间，然后界定空间内部的同质性，再排除异质性因素，哪怕是一个扩张性的、攻击性的行为，门罗主义也会以防卫性的修辞来阐述。直到今天，美国仍在使用防卫性的修辞来推行进攻。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和英国殖民主义、法国殖民主义的差别很大。

德国

一战之前的德国有大量关于建立大德意志还是小德意志的讨论，尤其是“中欧”这一核心概念，凝聚着德国大量地缘政治学家的想像。一战战败让威廉二世构建全球霸权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而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魏玛共和国采取了系统性的压制措施。不过，德国仍努力重建区域霸权，三十年代的施密特就贡献了很多理论想法。章永乐副教授认为，施密特是一个区域霸权的理论家：德国一方面作为区域霸权反对全球霸权，但另一方面又对区域内部的弱小国家和民族采取无视和压制的态度。

施密特认为历史上存在着两种门罗主义，刚诞生时期的门罗主义是正宗的门罗主义，而后经过罗斯福和威尔逊解释

的门罗主义，则已经被普世主义和干涉主义所引导，是被重新定义的门罗主义。这种门罗主义不是施密特所倡导的正宗的门罗主义，于是施密特努力用正宗的门罗主义反对不正宗的门罗主义。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大空间”理论，认为美国在美洲的霸权就是第一个“大空间”，它有一个核心的领导力量，而日本人则将其翻译成主导国，在大空间中有一个主导国，这个主导国用自己本民族的原则来指导整个大空间。

施密特实际上是运用了美国式的话语，来反对美国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当中对德国的压制。同时他运用美国的先例，为德国构建区域霸权提供话语上的指导和支持。甚至希特勒也下意识地用美国的门罗主义来为德国做辩护。施密特在提出大空间理论的时候，实际上他在政治上已不太受纳粹党信任了，所以大空间理论对希特勒和对纳粹党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但同时，大空间理论对日本的影响却不可忽视。二战期间，大量日本的国际法学家仿照施密特的想法建构所谓的广域国际法。

日本

日本开始运用门罗主义话语的时间可能比德国更早。1872年日本外务省聘请了法裔美国人李先德作为顾问，李先德当时非常清楚地把门罗主义思想讲述给日本，称日本在东亚也应该实行某种形式的门罗主义，要模仿学习欧洲列强对于东亚各国的做法。加之当时出现的亚洲主义，门罗主义与亚洲主义开始结合。

章永乐副教授经考证指出，1898年发生了标志性事件，

近卫笃磨在《太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证说未来黄白两个种族终有一战，日本要代表黄色人种，然后将黄色人种团结起来，和白人进行决战。亚洲就是日本需要团结的对象。近卫笃磨提出的保全中国诸如此类的论述都在里面。近卫笃磨还组织了东亚同盟会，同盟会对当时留日的精英，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都有很大的影响。近卫笃磨与孙中山、康有为等人曾有交往。康有为第一次见到近卫笃磨的时候，近卫笃磨就对他说：亚洲的未来就在我们两个国家的身上。

章永乐副教授认为，这一论断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美国对菲律宾的进攻，这被当时中日两国的精英视为白种人对黄种人的赤裸裸的威胁。虽然近卫笃磨提出了这个想法，但是因为日本的整体实力仍较弱，所以日本不敢公开把它作为官方理念。1902年，日本和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后，黄白人种间的斗争就更不能成为官方修辞了。但1905年美国国务卿西奥多·罗斯福在与日本外交官金子坚太郎会晤时，鼓励日本采取“亚洲门罗主义”。罗斯福认为日方可以在亚洲推行某种门罗主义，从红海一直到堪察加，在这片广大的地域上排除欧洲殖民者。

一战期间，日本部分地将门罗主义变成其对外政策，对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试图将中国全境变为其势力范围。此后的“西原借款”也有门罗主义的影子。1917年11月2日，日美签订《蓝辛—石井协定》，美国也承认日本可以把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设想为类似于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实际上美国给日本特殊利益空间的目的，是希望日本牵制欧洲列强，尤其是牵制俄国。

日本很快就受到了压制。一战结束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获得了一些好处，山东转让给日本被国际承认。各国签订《国联盟约》，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国联盟约》的第 21 条是威尔逊加入的，他提到了区域谅解这一概念，即某些区域特殊的安排可以被排除在国际管辖之外，相当于把美洲事务排除在国联管辖之外。日本对区域谅解概念十分认可。然而，1922 年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对山东问题进行了重新处理，日本被迫吐出多项军事与政治利益。列强对中国加强共同支配，抑制了日本对中国的“特殊利益”追求，这使得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遭到重大挫折，令日本精英愤恨不平。

1932 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列强间大打贸易战。日本在贸易上受到了列强的排斥，因而加紧筹划侵略满洲，9·18 事件的爆发与此关系慎密。9·18 事件后，国联对此有很多表态，日本也提出了很多国际法上的论据，比如侵略满洲适用于《国联盟约》第 21 条，满洲的事务属于区域谅解范畴，所以国际不应干涉。还有国际法学家诉诸于美国同意，引出了老罗斯福总统对日本采取“亚洲门罗主义”的鼓励，称日本可以在亚洲实行某种门罗主义。美国当然没有接受这种说辞，最终日本退出了国联。此后，日本门罗主义的叙述从东亚同盟变成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日本将日式门罗主义的范围从印度洋一直划到了南太平洋。

中国实践：反满门罗主义与省域门罗主义

门罗主义影响中国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从超国家层面下降到省域层面，甚至再下降到省域以下的地方层面；另一个

是中国的精英对美日门罗主义的回应，这一路径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外国来华传教士。

门罗主义在中国精英中的传播主要是在十九世纪末，留日精英在当时语境下看到美国进入菲律宾，也经历了日本近卫笃磨大力推崇亚洲门罗主义的过程，由此受到一定影响。章永乐副教授指出，梁启超领导的《清议报》团队，在门罗主义的传播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梁启超首先关注美国进入菲律宾这一事件，接着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政治口号，随后菲律宾人开始反抗美国，产生出“菲律宾是菲律宾人的菲律宾”的精神。在这之后，留日精英开始讲“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这其中隐含的是反满情绪，要将满族排除出中国。1900年也有人用这个概念来反对八国联军，称“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八国联军不应侵占中国”。

省域门罗主义

国家层面的门罗主义很快开始下沉到省域层面。曾协助过梁启超的欧榘甲将其变成一种地方主义的口号，提出“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认为由于满族的无能，广东才被列强攻破，与其如此，宁愿广东先独立，之后各省再逐渐联合，形成一个新的中国。有了新广东，接下来就有人呼吁新湖南等，在留日晚清精英的相互影响下，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多类似表述。辛亥革命后因为五族共和被民国推行，反满主义最终衰落并消失了，但地方主义却一直保留下来，在民国时期继续发展。地方主义常常被用来对抗其他省份，甚至对抗中央。为了应对地方主义，袁世凯做了很多国家建设的工作，军事上集中权力，财政上重建国家财政体系等等。然而在其

称帝后，各省纷纷反对，将他推翻，其国家能力建设的努力也都付诸东流。袁世凯死后，民国各省的碎片化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1917年，威尔逊重新解释了门罗主义，随着美国的参战，美国的宣传机器在中国开动，中国下层精英对美国有了更多的认识，对美国产生好感。他们认为门罗主义和联邦制两者整合在一起，体现的就是民主自治精神。两者的差别不大，只不过一个是国家层面，一个是国际层面，但都体现了民主精神。1917年民国开始分裂，各路势力寻求统一，但当时对于任何一方来说统一都十分困难。

为了克服这一难题，1920年出现了联省自治的呼声。这一时期的精英开始声称要实行各省的门罗主义，“某人之某”的口号开始出现，比如粤人之粤、浙人之浙、皖人之皖等。当时约有二十几种类似省域门罗主义的表达，有直接的表述方式，比如湖南门罗主义，广东门罗主义，奉天门罗主义，云南门罗主义等，也有非常强的“某人之某”的口号。这些门罗主义主要是用来对抗外省官员，比如要求督军应是本省出身，外省籍的督军要被赶走，此外各省还主张拒绝中央政府的干涉。

省域门罗主义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变种，比如“孙传芳门罗主义”。孙传芳是东南地区人士，他在东南地区画了一个圈，建立了五个省的门罗主义空间，并要以此推向全国，因此，他提出的“五省门罗主义”也由防卫性转向了进攻性。章永乐副教授认为，虽然没有考证孙传芳是否受到了威尔逊的影响或启示，但这种门罗主义的话语运用跟威尔逊的叙述

差不多：当它收缩时，门罗主义可以用来保境安民，自我防卫，这种门罗主义不干涉他人事务。但当主体选择对外扩张时，门罗主义中的空间概念就被弱化了，门罗主义的核心被重新解释为民主、自治、民族自决等。这种门罗主义可以被进一步解释为：因为有些地方人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宣称门罗主义的国家（省份）可以帮助大家，这种干涉有理有据

门罗主义的祛魅

门罗主义在中国同样经历了祛魅的过程。早期受日本门罗主义影响的诸多精英最终经历了幻灭的过程。比如康有为流亡日本后不久就看清了事实：日本人不会帮助他，所以他不久就离开日本，也不再讲明治维新和门罗主义了。梁启超也经历了这一过程，他先受到了门罗主义的影响，采取了日本的亚洲主义话语，但他很快就改变了，开始认识到日本包藏祸心，此后他认为亚洲的核心不应是日本，而应是中国。亚洲主义需要被改造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主义。

孙中山早年在日本演讲为革命筹资，他本人也非常支持日本，但在一战期间，日本支持段祺瑞等帝国主义的做法，让孙中山逐渐认清了现实。1924年，孙中山开始转向大亚洲主义，他在演讲中讲到王道与霸道，将日本人的做法视为霸道。认为俄国虽然是白种人国家，奉行的却是王道，苏俄应是中国盟友。

蒋介石早年称美国的门罗主义是帝国主义，但在二战期间，他改变了说法，认为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是坏的，而美国的门罗主义是善意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他需要获取美

国的支持。

从欧美留学归来的战国策派也经历了话语转变。他们主要受德国的影响，比如斯宾格勒和尼采等人的影响，提出未来世界会形成几个大的霸权，最后在全球统一之前，会以某种大帝国的形式重新整合世界。他们设想在亚洲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秩序整合，希望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

最后是李大钊。在出国留学前，他就已经看清日本的东亚门罗主义包藏祸心。在日本时，他也经历了“二十一条”，对日本的认识更加清晰。回国后，他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日本的门罗主义。此外，他还把超国家门罗主义和省域门罗主义放在一起批判，认为列强要对外扩张，其门罗主义话语便扩张到超国家层面；中国军阀没有力量，只能互相内斗，由此形成军阀的省域门罗主义。李大钊设想：第一，要通过革命来终结军阀混战的省域门罗主义。第二，在国际层面要旗帜鲜明，为此他提出一种新的亚洲主义。新的亚洲主义不应是霸权式的亚洲主义，而是尊重各个民族独立发展意愿，最后自愿联合形成某种区域的秩序。章永乐副教授高度评价了李大钊先生的思路，认为李大钊先生的想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一笔非常重要的话语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门罗主义话语回归超国家层面，国家一统让省域层面的门罗主义基本终结。毛主席曾说“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这是对美国门罗主义话语的反制。周总理接见智利文化界人士时说，美国有门罗主义，拉丁美洲也应该有一个新的拉丁美洲门罗主义。这是当时明确使用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和美国进行斗争。

章永乐副教授指出，目前有人质疑“一带一路”也是门罗主义，这是错误的。历史上，丝绸之路从来不是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也从来没有划定势力范围、界定同质性、排除外来势力的对外交往思路，这种思路以后也不会有。为何会有这样一种判断？原因是西方固有思维的偏见。比如英国路由器式的思维方式，认为只要在全世界掌握几个关键节点，然后再以人类的名义将这些节点连在一起，就能维持英帝国的运作。典型的例子是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而“一带一路”讲求的是互联互通，与英式的思路完全不同，更不是美国的门罗主义思路。

章永乐副教授最后总结称，“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瞬息万变，美国式的全球化已濒临终结，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仍不明朗。然而，世界秩序出现了新的转折，未来世界可能会出现一些空间的分化组合。世界已不再是平的，各领域将出现一些新边界，比如网络秩序、金融秩序、国际产业链，目前都在经历着重新组合。边界会发挥怎样的作用？章永乐副教授认为，多极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我们要考虑需要什么样的多极化。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或日本式的发展也是多极化的一种表现，但并不是世界需要的多极化。世界需要的是一个既有一定边界，同时各个空间中的国家也能进行协调和合作，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进行探讨的发展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门罗主义的发展历史可以为中国思考未来提供思想上的启发。但同时，门罗主义作为一种霸权主义话语，是值得被警惕的。如果未来中国需要运用这种话语，要特别小心，比如“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样的话语本身

含有帝国主义和殖民倾向，已经在全球思想史上留下坏的印象。如何正确理解门罗主义，正确活用门罗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值得当下中国思考的问题。

在主题报告后，各位与会学者就空间政治的概念、门罗主义的定义、门罗主义的地方性与普世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中国体验东南亚研究：一次逆向文化冲击

2021 年 4 月 27 日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经历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国人认识世界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客观上推动了区域国别研究的迅速发展。尽管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出现远早于“区域国别研究”，但后者近年来的蓬勃发展已经对前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大量学者投身与东南亚相关的政策类研究。“政策研究转向”反映了中国东南亚研究范式的转变，也与中国高教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大趋势的变化相呼应。当前，中国东南亚研究领域出现了一定失衡，表现为预研项目的快速增长、短期政策研究的绝对主导以及基础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进一步边缘化。基于各自独特的学科基础、语言项目覆盖、研究人员学术方向和地方政府政策偏好，中国各大学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新路径来开展东南亚研究。本期学者沙龙邀请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谢侃侃做主旨报告，通过分析国外东南亚研究领域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试图对不同研究路径的成效进行对比探讨。

一、美国的东南亚研究

• 美国东南亚研究概述

东南亚研究在美国是二战之后的产物。二战后，美国受国际大趋势的影响，特别是对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担忧，开

始非常严肃地讨论该问题，同时在原殖民地亚非拉地区领土运动兴起的大背景下，美国开始积极建设区域研究。美国早期关注的区域研究的重点是政治、近现代历史和其他比较宏大的社会问题。

美国第一批东南亚研究中心准确来说就是耶鲁和康奈尔两个学校，它们都是典型的东部私立研究型大学。它们有足够的财力、实力去培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同时招募了很多战前活跃于东南亚的美国人以及欧洲知名学者。

第二批东南亚研究中心兴起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一时期，由于越南战争，美国国内政治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对于美国的高等教育来说，东南亚研究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国防教育法。与此同时，以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基金会开始向东南亚研究领域大规模注入资金，开始在很多中部的公立学校建立区域研究中心。

第三批东南亚研究中心兴建于冷战后。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一些新的东南亚研究的区域联盟，同时有一些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慢慢跟进，也开始做东南亚研究。其中非常重要的、需要探讨的一点是，东南亚研究本身具有非常明显的脆弱性。东南亚文化具有多元性，它们的语言、国家、宗教、经济、社会各种状况都非常多元。所以东南亚研究，不能一开始就追求大而全，研究中心发展需要非常大的经费投入，却未必能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同时，关键人物对东南亚研究中心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关键人物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决定了整个

学校区域研究的走向，同时关键人物除了扮演教授的角色，还需要拉动社会资源、获取经费支持，去进行区域研究的建设。而美国高校的东南亚研究中心很早就达成了共识，单打独斗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一点上，东南亚研究与东亚研究是非常不同的。东亚研究几乎是一个完全竞争的研究领域，而在东南亚研究里面，各个学校知道，必须要抱团取暖才能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也因此共同创建了东南亚语言暑期学校（SEASSI-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ummer Institute），该暑期学校一直活跃至今。

• 区域研究中心和已有学科之间的关系

区域研究中心相对具体学科（discipline）来说，有着更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权。例如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它们的区域研究中心一度是可以授予学位的。但是康奈尔大学的乔治·卡欣后来总结说，如果东南亚研究中心过早独立、过早开始培养自己的学生，很大程度上会剥离他们跟原来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所以，过早独立反而会削弱一些区域研究中心。相对来说，康奈尔大学的模式其实更为稳定而成熟，即所有学生都受自己主修的科系的管理，同时在自己的学科之中进行学习，所有的教授由各个科系来聘用，这样一来区域研究中心和学科之间，可以形成非常健康的合作关系。因为学生有区域国别研究和学科的双重身份，所以这些学生在毕业以后找教职时，可以很好的与已有的学术生态衔接起来，因为他们是有相关学科背景的。而假如这些学生一直做东南亚研究，这样就有可能使这些学生毕业时的选择面非常狭窄。

当然，美国东南亚研究很快遭遇到危机，非常明显的就

是越战之后，东南亚研究的经费迅速减少，美国政府对东南亚研究投入也迅速减少，区域研究整体走向衰落。这也体现在开放的教职数量越来越少，老一辈的学者退休后，他们所在的院系并不打算补上东南亚研究的空缺。同时，很多东南亚研究中心的项目也逐渐失去了稳定的经费支持。

美国与中国有着不一样的学术生态，研究项目的存续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学生选修东南亚研究课程的兴趣。越战结束后，东南亚课程的选修人数持续走低，有志于投身东南亚研究的学者也呈锐减趋势。高校管理者对区域研究的关注和投入都明显降低。同时，东南亚研究中心也面临着其他区域研究机构的竞争，因此东南亚研究在冷战中后期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难。

• 区域研究的合理性遭到学界质疑

第一，区域的边界是模糊的，或者说受争议的，因此将区域研究放在区域这一载体里是否合理？同时，区域研究本身就带有内外之分，什么是区域研究？什么又是非区域研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似乎默认区域空间是社会的天然载体，在民族国家纷纷获得独立的国际大背景下，区域国别似乎也成为主流的叙事框架。但六、七十年代以后，大家开始挑战这种将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位的叙事方式。所以，将区域作为社会天然载体的研究范式也受到挑战。

第二，很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对区域研究的一个批评在于该领域的“本质主义”属性，即区域研究总是自说自话，认为各自所研究的对象国是特殊的、没有可比性的，这也导致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之间难以进行有效的学术对话。

第三，区域研究是植根于西方的殖民学术生产的传统，随着后来西方学界对东方学的批判，区域研究所带有的“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倾向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总体来看，美国的区域研究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立到后来发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即社科主导，人文研究相对边缘。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60%的东南亚研究学者都来自于社科领域，其中大部分是政治学领域的学者，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人类学家。这个基本的结构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所以文学、语言学、考古学在区域研究中一直都处于弱势。同时，国别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几个主要大国。受越战因素的影响，越南是受美国区域研究学者关注最多的国家，其次是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外界的影响方面，美国的学术共同体慢慢拓展，超越了美国及北美的地理边界，跟欧洲学界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往来。相对来说，美国学者也不太关注东南亚学者用当地语言发表的文章，而是更多的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材料的搜集地和理论的实验室。这与美国的东亚研究有很多可比之处，两者有着非常不同的研究路径和话语体系。

二、在中国东南亚研究学界感受的“逆向文化冲击”

• 中国东南亚研究近况

我国的东南亚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最早称为南洋研究。从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研究的转变，反映出从侨务知识生产向研究民族国家的转变，直到最近十年才出现了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东南亚研究。在整个过程中，中国研究领域的发展随着政府或者政策的需求以及资金规模而变化，可

以说研究领域的变化跟这些趋势的变化息息相关。2010年初，我国出现了区域国别研究。到2019年，在教育部注册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已经有400多个，还有很多并没有被承认的，大部分其实是虚体机构。

这一趋势对东南亚研究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首先，东南亚作为中国的周边地区，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南海、“一带一路”、东盟、区域合作，还有周边具体国家的政治变化。最近十年国内对东南亚研究的政策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随着中国公司走出去，大家对知识生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是，**东南亚研究的学者人数、科研项目、学术活动等**都成倍增长。

同时，东南亚研究也出现了以下一些较为明显的趋势：政策研究转向，**东南亚研究的一些主要期刊的选题、学科非常注重现实意义**，特别在中国区域研究发展背景下；皮书开始大量涌现，它们主要关注的是政策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而资讯的更新是非常迅速的，这就使得学者可以非常方便的追踪热点问题。大多数学者依靠中英文资料进行研究，学界也提倡使用小语种一手资料，但是似乎并非必须。而最近一段时间学术生态的变化，也使得学者面临着非常重的发表和评审的压力，所以有更多的学者投身于容易在短期内见效的政策研究。

《东南亚研究》和《南洋问题研究》是国内东南亚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两本期刊，它们的国别研究占将近4成，另外出现较多的主题是东盟问题、南海问题、双边问题、次区域

合作等，绝大多数都是政治经济类。国别研究占总数的 38%，其中政治类话题占据半壁江山，比例为 47%；经济类占 20%；广泛定义的社会或者文化相对来说占比较小。就具体国家而言，越南、泰国、印尼最受中国学者关注，这跟这些国家的体量、政治地位、容易发生各种事件的几率是息息相关的。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受到次一级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因近期缅甸的局势变化瞬息万变，缅甸研究变得非常活跃。相对来说，关注柬埔寨、老挝、文莱、东帝汶的学者屈指可数。

在政策研究主导的大背景下，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呈现出被逐渐边缘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跟以下几个大的趋势息息相关：首先，21 世纪前 20 年，中国高等教育急剧扩张，在这一背景下，实用主义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东南亚研究领域扩张的同时，老一辈归国华侨在世纪之交逐渐退休，他们所引领的文史传统慢慢变得较为边缘。相比之下，社会科学在近 20 年出现非常明显的科学化和国际化尝试，前者体现为各学科广泛接受或转向欧美的社会科学范式，后者严格来说是一种极不平衡的国际化。中国高校比较热衷于学习欧美经验，无论是高校还是学生，对东南亚的兴趣都不那么高，优秀的中国学子一般不会选择东南亚作为自己的留学目的地，因为当他们学成归来时，东南亚学历未必会被认可。除新加坡外，这样的趋势适用于整个区域。

在人文方面（如果我们把东南亚的语种项目算作人文），近 20 年非常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开设东南亚语种。然而，虽然语种项目呈爆炸式增长趋势，但这些项目

通常重就业、轻学术。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留学生在欧美进行东南亚研究时，经常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一种无意识的“中国中心主义”影响。欧美学界希望中国学生可以贡献更多的中国声音，好像中国去欧美研究东南亚的学生，应该做中国东南亚关系，或者华人华侨问题，对东南亚主流社会的研究反而是退而求其次，这也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

• 中国区域研究和学科间关系的探讨

美国大学开设或撤销一个区域研究中心跟各自学校的具体安排是息息相关的，而中国的区域研究却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中国高校受到自上而下的影响比较明显。我国设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其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是中国高校需要严格遵循的文件。目前，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开设了国别和区域研究二级学科，而最近又出现了交叉学科门类，使得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位变得更加复杂。总体上看，各高校在建设区域研究项目时有以下几个路径：

第一，综合性大学的专门研究院。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 2018 年成立的。此前，北京大学已经有比较好的学科基础。以东南亚研究为例，北大开设了最主要的五个东南亚语种专业。同时，国际关系方向也一直有学者从事东南亚方面的研究，历史系也有至少两名教师关注东南亚。因此，北大建设区域研究的重点是对现有体系的整合。清华大学直到 21 世纪初还是一个工科见长的高校，文科相对来说是后发的。但是，清华大学于 2011 年创办了发展中国家研究博

士项目，主要招收本科阶段已经有相关学习背景的学生，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或者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语种项目的毕业生。进入清华后，他们再进行具体学科的学习。相比之下，复旦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院是一个较为标准的高校智库，尽管该院进行了一定的跨学科的尝试，但其还是以国际政治研究为核心的。

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大学。北外、上外、广外、川外、天外这些外语类学校，基本在 20 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建立。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对第三世界有强烈的认知需求，所以建立了很多小语种项目。这些学校直到 20 世纪末都还是以外国语言文学为核心的专业性学校。但是 21 世纪以来，这些学校开始纷纷设立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传播学等学科。尽管如此，外国语言文学依然在校内保持着优势地位。在近十年区域国别研究兴起的背景下，外语高校开始进行新的跨学科尝试，例如，北外、广外、北语等高校在自己比较强势的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建立了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二级学科。而上外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设立了政治学一级学科，所以它的区域国别研究二级学科归属于政治学，而非外国语言文学。尽管这些学校有着不同的尝试，但是基本殊途同归：一是在语言教学和科研基础上进行跨学科尝试，二是用强势的语言项目来培育新的学科。第二种路径，姑且可以称作外语大学的学科化尝试。

第三，中国东南亚研究领域各省份的自然分工与相互竞争。广东、福建是重要的侨乡，他们的东南亚研究从一开始就比较关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广西

和云南因为有陆地边界，在外侨民相对有限，他们更多关注中南半岛，即与中国接壤的几个国家。21 世纪后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首先是沿海省份的高校，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都在原有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开始强调自己是国际关系学院，而非东南亚研究所，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东南亚”概念。厦门大学和暨南大学在建设国关学院的同时保留了南洋研究院和华人华侨研究所的称呼。而中山大学的改变则较为彻底，在更名为国际关系学院后，其东南亚研究所已不复存在。

此外，十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机构与中国国内政治生态之间的关系。其中，特别明显的是广西和云南之间的省际竞争，即对中国东南亚交流门户地位的争夺。过去十年，云南省社科院的区域研究刊物两次更名，从《东南亚》到《东南亚南亚研究》再到《南亚东南亚研究》。这其实反映了省一级政策的不断变化，而省一级的研究机构、高校也不断调整，以求顺应不断变化的政策需求。

总体而言，我国的东南亚研究虽然创立非常早，但最近十多年却受到区域国别研究的深远影响。东南亚研究领域的政策导向是非常明显的，政策研究和语言项目在此背景下呈爆炸性增长。但在这种趋势下，基础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变得相对边缘。不同高校基于各自的学科基础、语言覆盖广度及地方政策，丰富了开展东南亚研究的路径。

东南亚研究在 1975 年的美国出现了一个所谓“越南时刻”。即越战之后，东南亚对美国的相关性变弱，而美国的东南亚研究也因此变得相对衰落了。中国有没有可能遭遇

“越南时刻”？对中国的区域研究来说，“越南时刻”未必会出现。即便出现，也大概率不会出现在东南亚领域。昂山素季曾说，邻居是不能选择的。东南亚一直是中国周边的重要区域，它对中国的相关性始终会存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自传里写道，他觉得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东南亚研究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因为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被仔细研究过，即便有殖民研究、殖民知识生产的传统，但东南亚的很多事物对学界来说都是新鲜的。对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来说，新的其实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概念，东南亚研究本身其实已经形成稳固的传统了。所以，对于中国东南亚研究学者来说，东南亚并不是全新的。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非常有必要对这个领域进行新的探讨。

发言结束后，与会学者就中国东南亚研究进行了讨论。

有与会学者认为，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一些集中讨论的国家。从国别角度来讲，东南亚的这几个主要国家相对来说在东南亚或者中国和东南亚的事务当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同时，这些国家本身也有着较大的体量和影响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和国内从事这几个国家的研究学者人数比较多有关。中国国内学越南语、泰语的学生可能是国内学东南亚语言最多的。而关于印尼的研究，则是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的从印尼回来的归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关于印尼的研究，最初都是由归国的华人华侨带起来的。

此外，如果说中国 2010 年至 2020 年的区域研究与美国 1950 年至 1960 年相似，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中国 1950 年至

1960年的国际问题研究。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文革之前的东南亚研究或者是广义的亚非拉研究在中国高速发展。尽管当时能够投入的资源无法和现在相提并论，但是对东南亚来说，当时的重视程度同样是十分高的。因此，从这点来看，学术研究的重心或聚焦点在不同学科、不同地区之间是来回流转的。

也有与会学者强调了特殊区域的普世化表达的重要性。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美国一些学者不以国家或者区域为分析单位，而是下沉到某一具体社区，将一个特殊区域的特殊经验进行普世化的表达，使其变成社会科学能够普遍接受的范式，这点在东南亚研究上同样可以借鉴。

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施越在总结时表示，目前国内区域国别研究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政策研究，即对象国的情报研究。第二个层面则是外语教学，主要是服务于前者。两个层面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而目前的区域国别研究，其实也是以这两个传统为基础进行的，这也导致了不同国别的学者很难相互交流。本次沙龙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建设提供了很多思路与建议，相信在不同学科学者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会发展的越来越好。